

数字十九实虚反复转化的意义 ——兼论鲁迅小说中的数字内涵

魏耕原

(西安外事学院人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5;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2)

摘要: 极数十九经历了实虚反复转化的漫长演变过程。从先秦《左传》重耳出亡“十九年”的实数, 到《庄子》内篇演变为反复出现的虚化极数; 又由《史记·平原君列传》的“十九人”的可虚可实, 到《汉书》苏武拘禁匈奴的“十九年”, 以及玄奘取经“十九年”(一说十七年), 又回到实数; 复从鲁迅《孔乙己》中所欠的“十九个钱”的虚化, 似乎又是对《庄子》的回应。平原君的“十九人”, 又在唐诗与以后诗中演变为虚数。先秦—战国—汉代—唐代—鲁迅演变的四部曲, 基本呈现由实到虚的回环往复。从而形成了虚数与实数共同带有极数的意义。

关键词: 极数; 十九年; 实虚; 十九人; 十九个钱

中图分类号: I0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5)02-0038-05

鲁迅小说《孔乙己》多次出现“十九”这个数字。当孔乙己被人打断腿, “大约是中秋节前的两三天, 掌柜正在慢慢的结账, 取下粉牌, 忽然说, ‘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还欠十九个钱呢!’”^{[1](24)}当孔乙己被人打断腿, 最后一次“便用这手”撑着移到咸亨酒店, 要“温一碗酒”, 掌柜说: “孔乙己么? 你还欠十九个钱呢!”孔乙己仰面答道: “这……下回还清罢。这一回是现钱, 酒要好。”^{[1](24)}小说又在结尾写道:

自此以后, 又长久没有看见孔乙己。到了年关, 掌柜取下粉板说, “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第二年的端午, 又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中秋可是没有说, 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

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1](25)}

这篇小说作得很精心, 先后四次出现“还欠十九个钱”, 如果说中间两次是结尾的伏线, 那后两次又在结尾反复出现, 告诉读者: 孔乙己背负“十九个钱”的大债悄然死去, 连死的确切时间都不知道。这“十九个钱”对孔乙己来说, 应该是个大数。但为什么不欠十六个钱, 或十八个钱, 偏偏是“十九”之数? 鲁迅先生没说, 注释家亦未提及, 研究鲁迅的论者也没有关注过。此篇数字用得很精心, 是经过斟酌的。如孔乙己到咸亨酒店去喝酒, “便排出九文大钱”, 这个“九”往往引起论者注意。显示出不赔账, 精神一

长。“九”是大数, 但比起“十九”就小得多了。所以, 孔乙己只能有“九文大钱”, 而“十九个钱”就远非他所能拥有!《风波》里七斤嫂家的破碗, 先说钉了十六个铜钉, 结尾又是十八个。鲁迅在回复友人咨询的信中曾说: “六斤家只有这一个钉过的碗, 钉是十六或十八, 我也记不清了。总之二数之一是错的, 请改成一律。”^{[1](113)}看来十六与十八在鲁迅眼中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孔乙己所欠的“十九”个钱, 虽然和十六和十八一样, 均表示多数, 但在文中反复出现, 似乎具有一定的特殊象征意义, 它又象征什么? 这就需要一番追本溯源。

在两位数中, 表多数的十二、十八、二十四、三十六、七十二、八十一, 使用的频率都比较高, 但十九就显得冷落多了。“十九”最早而著名的, 大概是春秋时重耳即后来的晋文公因骊姬之乱而出亡的十九年。《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城濮之战前楚子曾说“晋侯在外十九年矣”, “昭公十三年”又载叔向说, “我先君文公”, “亡十九年, 守志弥笃”。^{[2](1352-1353)}重耳于鲁僖公五年出奔, 至二十四年方返晋, 整整十九年。《左传》记载历历清楚, 这十九年应当是实数。楚国是重耳出亡时栖息地之一, 楚子言及晋文公“在外十九年”, 是说他备尝“险阻艰难”, 指出他得志于晋国, 是强大的劲敌, 以此劝阻子玉勿与晋军争胜。这当然是可信的, “十九年”于此不可能是虚数。叔向是晋国

收稿日期: 2014-07-10; 修回日期: 2015-01-16

作者简介: 魏耕原(1948-), 男, 山西周至人, 西安外事学院人文学院特聘教授,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先秦至唐代文学

的智者，不可能把“先君文公”流亡十九年的大事说得不确切。他们都说是在外十九年，可见无可置疑。晋文公返国后称霸中原，成为强国。所以，“十九年”由此具有一定的特殊意义。就是说如果经过如此长的年月磨炼，必然会成就一番大事业！

其次，便是《庄子》给“十九”带来的虚数化意义。内篇《养生主》说：

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3](125)}

又有《德充符》的申徒嘉师从的伯昏无人所说的“吾与夫子游十九年矣”。还有《大宗师》女偶说卜梁传从己学道的次第：“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3](258)}三日后可以忘记世界，再学七日便会忘记人事，又学九日就能达到忘记自己心性的境界。这是庄子进入大道的修养次序，合起来不多不少又是“十九”，它是由三与七再加九合成的。而这三数又都是个位中的大数，合起来自然就成了两位数中的一个数。这与技进于道的庖丁之刀用了十九年仍能像“新发于硎”一样，可见庄子不仅对此数字情有独钟，而且是他宣扬大道的象征与符号。它和实数无涉，只能看做一个极数，一个象征数字。而且它和其他两位数的极数相比，极为罕用，带有一定的神秘性。那么，它的神秘性又是什么呢？

正如治庄学者所言：“我个人引为奇怪的一点是，《养生主》的庖丁解牛，庖丁之刀用了十九年，此处的申徒嘉，同伯昏无人游了十九年；《大宗师》的女偶训练伯梁倚学道，基本功夫则用了十九日。十九这个数目，在庄子思想中必有神秘的一种理解，可惜《庄子》中没有说明。是一遗憾。我们也难妄作解释。”^[4]

除了以上几个为人所知的“十九”外，还有几个不大为人留意的“十九年”。《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有：“昭公十九年矣，犹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终也。”^{[2](1186)}《庄子·在宥》亦有：“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3](379)}《墨子·明鬼下》谓句芒神赐郑穆公寿“十年有九，使若国家蕃昌，子孙茂，毋失”^[5]，《论衡·无形篇》载此事则谓是秦穆公，孙诒校注《墨子》认为郑穆公是秦穆公之讹，毕沅注《山海经》谓郭璞注此书引此亦作秦穆公。

据以上材料，另一研究庄子者认为：《左传》的

“十九”年，皆是模式化的用法，以突出时间之长久，并不一定实指十九年，可为《庄子》的神秘用法提供先例，并且指明“十九年”的象征蕴含，“似在于某种整体时间的周期性，而不在于阴数阳数之合或十年九年相加”。^{[6](314)}以阴数阳数之合解释“十九”，是成玄英的《庄子疏》在解释庖丁之刀已用十九年时所说：“十，阴数也；九，阳数也；故十九极阴阳之妙也。是以年经十九年，牛解数千，游空涉虚，不损锋刃，故其刀锐利，犹若新磨者也。”^{[7](68-69)}这是把“十九”分解为“十”和“九”两个极数的阴阳组合，“故能成阴阳之妙要，极至理之精微”^{[7](117)}。

认为“十九年”是“象征蕴含似在于某种时间的周期性”的论者，又说：“上帝赐寿给明德之人的年限为什么不多不少恰恰为‘十九年’？与《庄子》《左传》的用例联系起来，‘十九年’作为周期循环之极限数才会有此神秘的象征寓意，其虚指时之长久，未必落实于一十九度春秋”。^{[6](315)}便由此出发联想到历法中的十九年闰七个月：

历法的周期与祭祀的周期本来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也是人的社会与鬼神世界的沟通的“神秘语言”。如此看来，早在东周以降的《周易》天地阴阳之数概念产生之前很久，“十九年”已随着置闰法的进化而具有了特殊的数外之意。殷商时代留下来的这笔思想观念的遗产，在周人统治的世界中必然遭到某种程度的否认和遗忘。我们在《尚书》《诗经》《论语》《孟子》等宗周的、儒家的文献中根本看不到“十九年”的丝毫迹象，为什么墨子和庄子偏偏成为例外呢？……庄子与墨子虽属不同学派，但二人都出于宋国，即殷之末裔之地，只有在宋人的文化传承之中才更多地保存着先商的宗教礼仪和观念习俗，……与殷商礼俗相联系的“十九年”神秘数也唯有在他们两家的著述中才不绝如缕地沿袭下来。……《红楼梦》中那位离经叛道的贾宝玉始于大荒山青埂峰下的顽石，红尘历劫十九年后又回归于顽石，可否视为庄子‘十九年’周期的千古回响呢？^{[6](318-319)}

这是迄今为止对“十九”最为详细的解释，论者为解密“十九年”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也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同时也滋生了不少疑问。

首先，“十九年”最早反复出现在《左传》，而不是《墨子》与《庄子》，而且《左传》重耳出亡“十九年”是实数而非虚数，已如上言。并且，杜预注说：“晋侯生十八年而亡，亡十九年而反，凡三十六年，至此四十矣。”^[8]清人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亦言：“晋文公避骊姬之乱，经历狄、郑、卫、齐、宋、曹、楚、秦诸国，备尝险阻，以老其才，凡十有九年，卒

反晋国。”^[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也说：“晋文从僖五年出奔，在狄十二年，二十四年方入境，以夏正数之，则整十九年。”^{[2](456)}《史记·晋世家》谓重耳在晋献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55)出亡，晋灵公十四年(前637年)返国，前后也是十九年。《左传》“僖公五年”谓重耳“处狄十二年”，《史记·晋世家》言“留齐凡五岁”，那么在郑、卫、曹、宋、楚、秦凡两年。又言“重耳出亡凡十九岁而得入”。《国语·晋语二》言献公二十二年重耳出亡，其年即鲁僖公五年。《晋语四》言“文公在狄十二年”，狐偃劝重耳速行离狄，“蓄力一纪，可以远矣”，以及返晋时间，均与《左传》相合。刘向《说苑·复恩》所记，有晋文公所说的“吾亡也十九年矣，今将反国”，虽为小说家言，但此“十九年”未必为虚，他是以先秦数种典籍为据的。把这“十九年”以及《左传》“昭公十三年”的晋文公“亡十九年、守志弥笃”，还有“襄公三十一年”的“昭公十九年矣，犹有童心”，统统都说成“皆是模式化的用法，以突出时间之长，并不一定实指十九年，可为《庄子》的神秘用法提供先例”^{[6](314)}，是靠不住的。

其次，无论是《左》《庄》，或《墨子》，其中的“十九年”都不存在“周期性”的特点，即循环的特点，在凡所出现的先秦文献中缺乏如此的证据。

再次，如果把《庄子》的“十九年”和“十九年闰七个月”联系起来，那么《庄子·大宗师》的卜梁倚学道之“十九日”，又当作何解释？

《左传》等先秦文献记载重耳出亡十九年，晋文公后来又成为春秋五霸中最著名的霸主，这是春秋时的一件大事，所以十九年由此上升为要作一番大事业所需的极数。它成了象征成功的符号，其义在于数字本身，而后边的“年”字可以去掉，还可以换上其他的量名词。活动在战国中期的庄子，对晋文公十九年流亡之知悉，则肯定无疑。《庄子》内篇中反复出现的十九年，而与《左传》晋文公之十九年，必然具有一定的联系，或者说《左传》给《庄子》的滋生启发具有酵母素作用。重耳十九年终于成就了返晋为君以为霸主的大事业，很容易使人把“十九年”这一时段，看作成就大事业的极限。而且“十九”，又可看成十二加七，且两数均为习见的大数。《庄子》内篇与《孟子》篇数都是七，《左传》中的养由基射箭之力可穿七层铠甲；申包胥求援兵在秦廷哭了七日七夜，后两者就不一定是个实数，而是作为极数出现。至于十二，更是一大数，原本亦从实数衍变为虚数性的极数。年之月份为十二则是实数，一日的十二时辰亦同于此。

如同七与十二又为虚数中的极数，“十九”同样

具有实数与虚数中的极数的两层含义，实数由《左传》奠基，虚数的极数义则由庄子发展而成，成为他的预言中反复使用表示极限的数字。如果说十二与七如同颜色中的原色，而十九则如间色，间色在古人眼中非正色，不被看好，因而作为极数的十九很少被人使用。

《史记》喜用极数，如说项羽与李广都身经七十余战，只能当极数视之，而并非实数，只是说他们作战次数很多。《平原君虞卿列传》记秦围赵之邯郸，平原君赵胜将求救于楚，从门客中挑选随从“得十九人，余无可取者，无以满二十人”^{[10](2366)}。于是有了毛遂自荐，而“十九人相与目笑之而未废也”^{[10](2367)}。然而“毛遂比至秦，与十九人议论，十九人皆服”^{[10](2367)}。最后毛遂威逼楚王歃血联盟成功，便谓十九人“公等碌碌，所谓因人成事者也”^{[10](2368)}。这一部分文字频频出现“十九人”，与毛遂一人反复形成对比，就是强调多与寡的对比。联盟求援是否就非要带上二十人，恐不见得。其所以如此写来，太史公之意大概看中了“十九”这一数字的极数意，好用来与毛遂一人形成对比。一部《史记》最乐用对比手法刻画人物，比如项羽之于刘邦，廉颇之于蔺相如，李广之于卫青等。为了突出毛遂，“十九人”就派上了用场。太史公非常看重“非常倜傥”之人，自然会想到庄子的“十九年”。因而与其把这“十九人”看作实数，还不如视作虚数更有意义。或者说太史公的“十九”是对《庄子》“十九”的回应。

以后作为虚数的回应较为罕见，倒是作为实数的十九，却又在两个重要人物身上先后出现。一是苏武出使匈奴拘禁了十九年，《汉书·李广苏建传》说苏武出使匈奴凡百人，至归时，除去“前以降及物故，凡随武还者九人”^{[11](2466)}。“武留匈奴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11](2467)}。苏武在艰苦磨难中坚持了十九年，终于完成了一桩特大使命。到西域取经的玄奘说，“以贞观三年仲秋朔旦，褰裳遵路，杖锡远征”，到“十九年春正月，达于京邑，谒帝洛阳”^[12]，前后共十七年。但一说远征时为贞观元年，这样便成了十九年，后说可能受到重耳与苏武十九年的影响。至于回归当年即贞观十九年(645)，上疏请派助手襄助翻译佛经，得到太宗支持。一直到高宗麟德元年(664)，共译经论74部，凡1335卷，成为最伟大的翻译家。而这前后所用十九年，罕为人道，大概因取经十九年为人盛传而译事为人淡忘。总之，“十九年”是成就各种不同大事业的极限时段。“十九”因此成为极数的意义，也就更为巩固。

以上作为实数的“十九”都带有极数意义。《史记·乐书》说：“至今上继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

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文。”^{[10](1147)}司马贞《索隐》说：“（《汉书》）《礼乐志》《安世房中乐》有十九章。”^{[10](1177)}这当然是实数了，其所以要作到“十九章”，亦取极数意义。乃祖刘邦《大风歌》虽仅三句，但“三”是大数。汉武帝好大喜功，就要把房中之乐作到十九章，一定要显示出极数的意义。《后汉书·宦者传》载，宦官孙程等人拥立济阴王，是为顺帝，孙程等人封为“十九侯”。这是实数，也是大数，以显示他们杀伐予夺之威。在汉乐府的琴曲歌辞里，除了《胡笳十八拍》，还有《胡笳十九拍》。郭茂倩说：“《琴集》曰：‘大胡笳十八拍，小胡笳十九拍，并蔡琰作。’按蔡翼《琴曲》有大小胡笳十八拍，沈辽集世名流家声小胡笳，又有契声一拍，共十九拍，谓之祝家声。祝氏不详何代人。李良辅《广陵止息谱序》曰：‘契者，明会合之至理，殷勤之余也。’李肇《国史补》曰：‘唐有董庭兰，善沈声、祝声，盖大小胡笳云。’”^[13]《胡笳十九拍》的歌词今已失传，可见十八是习见的大数，十九则为少见的极数，故《十八拍》流传至今。

在官制上，还有十九曹，亦取大数意，目的在于张大新朝。曹魏末年，主管朝廷文书与奏章的尚书分为二十五曹，西晋分为三十五曹。东晋初偏居江左，仅余十七曹。刘裕称帝后则扩大到十九曹，事见《宋书·百官志》。刘裕的字写得很丑，后来特大其字，一纸只书七八字，以张其威，以威遮丑。他把尚书扩大到十九曹，用意恐怕亦属此类。所以，到了其子宋文帝就减少到十五曹。

著名的《古诗十九首》，见于萧统《文选》。当时的汉代“古诗”就有五十七首，除了“十九首”外，被称为“古诗”的“步出城东门”一首，无论内容与风格都与“十九首”颇为相近，而萧统为何只选了“十九首”？毋庸置疑，萧统也是看准了“十九”的大数意义。既然是“选”，就可以有自主性，而以“十九”为数，除了大数意义，还有一层代表的涵意在內。

孔颖达《春秋左氏传正义》在“襄公九年”之“祀盘庚于西门之外”下，疏解说：“盘庚，汤之九世孙，殷之第十九王也。”^{[8](1941)}《史记·殷本纪》《三代世表》《汉书·古今人表》，以及殷墟卜辞，皆以盘庚为殷商十世之君^{[2](963)}，十世之君与第十九王并无差异之区别，因殷商王位继承权经常有以弟继兄的习惯。

“汤之九世孙”，正是十世之君。按《殷本纪》逐王计数，亦正是“殷之第十九王”。孔颖达不按代记，而按王算，或许与“十九”是大数，具有一定的联系。

如同刘裕分外看重十九的极数意义，武则天革命，

以周代唐，出于同样的目的，为了展示改天换地的新气象，似乎要效法秦始皇“书同文”的伟迹，亲自“出新意持臆说，增减前人笔画，自我作古为十九字”^{[14](18)}。“当时臣下章奏与天下书契，咸用其字。”^{[14](18-19)}新造而取代的十九字是：天、地、日、月、星、君、年、正、臣、照、戴、载、国、初、证、授、人、圣、生。如果把这些字重新组合，或许就有了下面的意思：日月星初照，天授圣人生，地载国，君臣正，戴年证。正是出于鼓吹新周的目的。而且她用其中的“照”字作为她的大名，生造成“曐”，取法日月经天，用意不言而喻，而传到今天。然要把所有文字都新造一番，并不是她的本领所能许可。于是，就精心选择了这些最具政治革命代表的字眼，不多不少，偏偏也正好是十九个字，开疆扩土的汉武帝有“十九章”的诗，她为什么不能生造“十九字”呢！

毛遂自荐中的“十九人”，在唐诗中有所回应。中唐代宗大历十三年（一说大历三年）进士及第的高拯《及第赠试官》说：“公子求贤未识真，欲将毛遂比常伦。当时不及三千客，今日何如十九人。”^{[15](3194)}就是以毛遂自喻，以“十九人”喻因人成事的及第者，以公子平原君喻试官。张籍的《哭孟寂》：“曲江院里题名处，十九人中最少年。今日春光君不见，杏花零落寺门前。”^{[15](4362)}孟寂是孟郊从弟，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与张籍同年进士及第。《全唐诗》诗下注：据唐进士《登科记》，“其年进士十七人，博学宏词二人，故诗云十九人。”^{[15](4362)}此“十九人”则为实数，然亦有非实数者。元好问《帝城》其一：“悠悠未了三千牍，碌碌翻随十九人。”^[16]亦以“十九人”指碌碌无为之辈，当然是虚数中的极数。

到了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自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设局修撰，到宋神宗元丰七年（1804），全书始成，所以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说“历十九年而成”，以后便成为定说。其实，未设史局以先，他已把战国和秦代的史事，作了八卷，称为《历代君臣事迹》，《资治通鉴》不过是他的继续。这样说来《资治通鉴》至少用了二十年出头的时间，而胡氏及后人只说是十九年，是从正式设局算起，而且包含了“十九”本身所具有的大数意义。

除以上诗歌、音乐、造字、寓言、官制以及史事以外，游戏也把“十九”派上了用场。弈棋（即围棋）纵横以十九路为格局，就像关中农村流行的“摆方”以七路为格局，或如象棋纵九路，横为十路，中隔一河，实际也是九路，七、九、十九都是单数，也是大数，弈棋路多复杂费时。晚唐裴说《棋》说：“十九条平路，言平又险巇。人心无算处，国手有输时。”^{[15](8344)}

这是说它的复杂性。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载法远禅师就弈棋说法：“从前十九路，迷误几多人。”^{[17](224)}这是说它颇费时间。可见“十九”之大义。

由上可见，自庄子以后直至唐代，“十九”只作为实数出现。至金代元好问的诗中，则为虚数。综合看来，“十九”起始以重耳出亡的实际年数见称于世，到了《庄子》转入虚数；到了苏武的“十九年”好像是对晋文公的自然回应。而平原君的“十九人”看似实而委实近于虚数。到了唐代上承汉代余绪，因“十九人”典故的深入，同样出现了虚实并用的现象。“十九人”因《史记》又浸入碌碌无为之义。

我们知道，曹雪芹对《庄子》特别垂青，因而让贾宝玉历经“十九年”人世红尘，便皈依佛门，进入清静世界。这“十九年”，同样带有极数的意义。对于庄子的冷嘲热讽，鲁迅极感兴趣。同样对于庄子反复使用的“十九”的大数意义，也不能说不心领神会。至于孔乙己所欠的“十九个钱”，则显然借用虚数所蕴含极数的意义。也就是说它对孔乙己是个极大的数目，直至死亡也无法还清这笔赊欠的大账，背着这笔重债悲凉地悄然死去。这个沉甸甸的极数，让读者咀嚼孔乙己深沉不幸的悲剧！或许这正是为了揭示辛亥革命以后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遭遇，而用“十九”这个大数让孔乙己背负着离开人世，展示他们生存维艰的现实与命运，包括人们对他们的鄙夷与嘲笑！

参考文献:

- [1] 鲁迅. 鲁迅书信集[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6.
- [2]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3] 郭庆藩. 庄子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 [4] 王孝鱼. 庄子内篇新解·庄子通疏证[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3: 103.
- [5] 吴毓江. 墨子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332.
- [6] 叶舒宪. 庄子的文化解析[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7.
- [7] 郭象注. 成玄英疏. 南华英经注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 [8] 阮元校. 十三经注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3960.
- [9] 高士奇. 左传纪事本末[M]. 卷二十五·晋文公之伯.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319.
- [10]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11]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 [12] 玄奘. 大唐西域记·记赞[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749-751.
- [13] 郭茂倩. 乐府诗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861.
- [14] 宣和书谱[M].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9.
- [15] 全唐诗[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16] 狄宝心. 元好问诗编年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253.
- [17] 胡仔.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224.

Significance of repeated fact-to-function conversion of the number nineteen: also on the meaning of numbers in Lu Xun's novels

WEI Gengyu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Xi'an Institute of Foreign Affairs, Xi'an 710065, China;

College of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The ultimate number nineteen in Chinese went through a long evolution from fact to function and from function to fact. In the Pre-Qin, the “nineteen years” of Chonger’s exile in *The Chronicles of Zuo* was factual; in *The Inner Chapters of ZHUANG ZI*, the number nineteen appeared repeatedly and evolved into a functional ultimate number. Later, the number became both factual and functional in the “nineteen people” in *The Biography of PingYuan the Gentleman* in *The Books of the Historian*, but it became factual again in the “nineteen years” of Su Wu’s captivity by the Huns in *The History of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nineteen years” (or seventeen years according to a different source) of Xuanzhuang’s journey on a pilgrimage for Buddhist scriptures. Corresponding seemingly to its functionality in *Zhuang Zi*, the “nineteen-coin” bills in *Kong Yiji* by Lu Xun was thought to be functional again. The “nineteen people” in *The Biography of PingYuan the Gentleman* was transformed into a functional number in poems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in later times. As a result, it is the repeated fact-to-function conversion of the number nineteen that brought about the situation in which both factual and functional nineteen have the meaning as an ultimate number.

Key Words: ultimate number; nineteen years; conversion from fact to function; nineteen people; nineteen coins

[编辑: 颜关明]